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

定窑

D I N G Y A O

◎耿宝昌 涂华 主编

◎王莉英 穆青 耿琪 穆俏言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定窑

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

王莉英 穆 青
耿 琪 穆俏言/ 著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我国陶瓷历史悠久，古陶瓷深受世人青睐，国内外倾其毕生精力搜集、珍藏、探索和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研究和保护力度的加强，有关部门对一些历史名窑相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与整理，所掘精品迭出不穷，弥补了古陶瓷鉴赏中历史资料之不足。一些古陶瓷研究与鉴赏中的难题，也随着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迎刃而解。不少文物专家、学者，穷其一生着力于一个窑口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之成果。

江西美术出版社从需求和可能出发，策划出版《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以各窑系、窑口古瓷的鉴赏命题，约请各方专家著述，这对于系统介绍唐宋以来各名窑名瓷详情、弘扬传统文化，实为可贵。每部书稿资料翔实，论述周详，剖析精微，相形于时下众多泛泛而论的鉴赏之作，实为述而有纲，言而有物。垂注于古陶瓷的鉴赏者如能从一个窑系、窑口的研究出发，触类旁通，这也是古陶瓷鉴赏的一条门径。

《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补史料之缺，应大众之需。编撰者已经辛劳数年，今观新篇，欣慰之至，志此数言，是为序。

耿宝昌

于北京

第一章 定窑概述 / 1

(一) 窑场自然条件 / 3

(二) 曲阳文化历史 / 3

1 历史沿革 / 3

2 北岳祭祀与曲阳城的发展 / 4

3 优秀的科技文化传统 / 5

4 佛教文化与石雕艺术 / 7

(三) 考古调查与发掘 / 9

(四) 烧造历史及分期 / 12

第二章 产品类别 / 15

(一) 黄釉瓷 / 16

(二) 褐釉瓷 / 17

(三) 白釉瓷 / 17

(四) 黑釉瓷 / 18

(五) 酱釉瓷 / 19

(六) 低温铅釉 / 21

1 唐三彩 / 21

2 黄釉、绿釉 / 21

第三章 装烧工艺 / 23

(一) 支钉叠烧 / 24

(二) 正烧 / 25

(三) 覆烧 / 25

(四) 涩圈叠烧 / 26



第四章 鉴赏基础知识 / 27

(一) 胎釉特征 / 28

(二) 造型艺术 / 29

1 晚唐五代时期 / 29

2 北宋早、中期 / 35

3 北宋后期至金代 / 43

(三) 装饰技法 / 47

(四) 典型纹饰 / 53

(五) 瓷器铭文 / 61

1 『官』『新官』款铭文 / 61

2 『尚食局』『尚药局』铭文 / 66

3 其他铭文 / 68

第五章 窑系窑口的特征 / 73

(一) 晚唐、五代 / 74

(二) 北宋至元代 / 76

1 邢窑(河北临城) / 76

2 井陉窑(河北井陉) / 76

3 磁州窑(河北磁县) / 76

4 介休窑(山西介休县) / 77

5 霍窑(山西霍县) / 77

6 彭县窑(四川彭县) / 77

第六章 仿品概述 / 79

(一) 元、明、清三朝仿定概况 / 80

(二) 建国以后曲阳仿定概况 / 83

(三) 曲阳现代仿定制品辨识 / 83

第七章 名品鉴赏 / 87



第一章

定窑概述



定窑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一带。曲阳自北魏至唐宋一直隶属定州，按照我国古瓷窑以州冠名的惯例，曲阳县境内的窑场称为“定窑”。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表明，涧磁村是定窑的中心窑区，总面积约为117万平方米。窑区内窑具、瓷片等废弃物的堆积，形成17座大小不等的小山包，可以想象彼时烧窑时窑火通明，出窑时白瓷如雪的壮观景象。

定窑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窑场，从唐至元经历了几百年的盛衰发展，它的产品种类繁多，烧造量大。其中宋金时期清丽素雅的刻花白瓷与富丽堂皇的印花白瓷，是定窑最主要的两个品种，代表了定窑鼎盛时期的典型艺术风格。

定窑白瓷制品精良、产量巨大，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海外，同时也得到了皇室贵族的赏识，带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等铭文的定瓷，显然是供各级统治阶层使用的。

优良的产品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使定窑成为当时诸多窑场模仿的对象，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资料揭示，河北省的井陉、临城祈村、磁县观台，北京市门头沟龙泉务、密云小水峪、房山磁家务，山西省平定、介休、河津、交城、阳城、霍州、长治、孟县、榆次、浑源，四川省彭县，江西省景德镇、吉安等地，都曾仿烧定窑刻花、印花白瓷，从而形成了一个横跨南北的庞大窑系。

随着窑址考古发掘以及墓葬、遗址、塔基、窖藏等出土资料的增丰，学术界对定窑制瓷史、定窑装烧工艺、定窑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然而，窑址发掘面积的局限，加之纪年墓葬出土的定瓷在编年中尚有不足，致使对定窑制瓷史分期的研究、装饰工艺技术承启与转型发展的研究、定窑中心窑场制品与窑系诸窑制品间同异的研究、定窑白瓷“官”、“新官”款的研究以及对定窑鉴定、鉴赏的研究等等，尚不能更加深入完善地展开。

为便于读者对定窑烧造史、不

同历史时期制品的特点、烧制工艺、装饰风格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初步把握,本集将分“定窑概述”、“产品类别”、“装烧工艺”、“鉴赏基础知识”、“窑口判别”、“仿品辨识”、“名品鉴赏”等章节论述,并配以彩图、线图,以助于提高读者对定窑的鉴定、鉴赏力。

(一) 窑场自然条件

定窑遗址位于曲阳县城以北约25公里的灵山盆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是曲阳县的主要产煤区。据《曲阳县志》记载:“灵山一带,惟出煤矿,龙泉镇则宜瓷器,亦有出滑石者。”“涧磁岭,采访册在县北六十里。按岭在龙泉镇之北,西去灵山镇十里,上多煤井,下为涧磁村,宋以上有磁窑,今废。”从区域地质构造上看,这里正处在阜平隆起东侧的灵山向斜中,煤田分布在东北至西南长约15公里,西北至东南宽2至6公里的山间瓢形盆地。经勘测,灵山煤矿的范围总面积约75平方公里,总储量1.5亿吨,覆盖灵山、南镇、郭家庄、党城4个乡镇。灵山煤田煤层分布的特点是边缘部分浅,盆地中心深,涧磁、燕川两处遗址的周围以前曾有多处小型煤窑。

灵山盆地除了煤炭之外还蕴藏着丰富的黏土矿。北方黏土矿大多是伴

生于古生代及中生代煤系地层中,曲阳县的黏土矿也不例外,主要集中在灵山盆地东部及北部的边缘地带,矿脉由庞家洼向东一直延伸到北镇。

涧磁村定窑遗址位于灵山盆地东北角的南镇乡,这里地处太行山东麓余脉,地势起伏,其间穿插着许多自然地沟。村东1公里是北镇村,村南原有一眼清泉,称为“龙泉”,故这里以前叫作“龙泉镇”。清代道光年间,龙泉镇改称“镇里墩”,后分成南、北两村,北镇村位于龙泉之北,故名“北镇”。《曲阳县志》中提到的龙泉镇即现在的北镇和南镇。南镇乡境内共有两条河流经过,发源于阜平、涞源、唐县交界处的通天河^[1],自北向南经邓家店流向南镇。发源于曲阳县北部的三会河^[2],自西向东流经灵山镇在南镇村东北与通天河相汇,然后于横河口村北流入唐县境内的西大洋水库。涧磁村定窑遗址正处于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

东、西燕川定窑遗址位于灵山盆地的西南角,东距灵山镇4公里,两村相连坐落在一处地势平缓的山坡上。村子北面是凤凰山,西北是鸡冠岩山。相传村中有一燕子洞,故位于燕子洞东侧的村庄取名“东燕川”,西侧的取名“西燕川”。东、西燕川定窑遗址主要分布在两村之间和村子北侧。

灵山盆地丰富的煤炭和瓷土资源构成了大型窑场所必需的原料、燃料供应体系,窑址附近的河流又为制瓷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这些优厚的自然

条件为定窑延续几百年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二) 曲阳文化历史

曲阳县地处华北平原西部的太行山东麓,这里西依太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于山前平原结合部。横亘南北的太行山脉在这里走向偏西,曲阳恰在弯曲处之阳面,据《水经注》记载:“县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可见“曲阳”之名是源自它独特的地理环境。

1. 历史沿革

曲阳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考古调查证实,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位于曲阳县晓林乡的钓鱼台,是一处具有较大规模的仰韶文化遗址,在约7万平方米的氏族村落遗址中,出土了石斧、石锛、燧石、骨铲、骨针以及大量彩绘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根据出土文物推断,钓鱼台遗址距今已有5000余年历史。在曲阳县城西北约1公里的白家湾、孟良河一带,也曾发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春秋战国时期,曲阳隶属于由“白狄”统治的中山国,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国,“合军曲阳……中山献四邑和”。这是史料中最早关于曲阳地名的记载。公元前296年,中山为赵国所灭,包括曲阳在内的中山国城邑版图悉入赵

[1] 通天河发源于神仙山(即古恒山,又称“大茂山”)南麓,因源头地势很高,水似从天而降得名,又因水源于恒山故又称“恒水”,系季节性河流。

[2] 三会河发源于曲阳县北部青山、铺塔石、红岗三处,三条支流于仁景树、葫芦汪一带相汇,故称“三会河”。三会河从磨子山至南镇段除汛期外,其他季节均干涸无水,故又名“干河沟”。

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王嬴政把传统的诸侯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将天下划分为36个郡,郡下统县。曲阳当时隶属于恒山郡,恒山郡辖地大致为战国中山故地,辖有6县,曲阳建县当始于此时。西汉初期,为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将恒山郡改名为“常山郡”,曲阳县亦改隶常山郡。当时,在巨鹿郡所领的21个县中有一个县与曲阳重名,故将常山郡之曲阳县称“上曲阳”,将巨鹿郡之曲阳县(今藁城、晋县)称作“下曲阳”。汉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郡国的控制,在全国设置了13个州部,曲阳所在的常山郡(即秦代的恒山郡)属冀州刺史部。这种由郡、县两级制向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建置的转化,到东汉时期基本完成并一直沿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98年,北魏占据了幽、冀诸州之后,拓跋珪相继在河北境内设置了12个州,北魏天兴二年(400年)设置定州,辖5郡29县,曲阳隶属定州中山郡,此后随着朝代的更迭,曲阳的名称及建置区划虽偶有改变,但绝大部分时间隶属定州。

2. 北岳祭祀与曲阳城的发展

据《曲阳县志》记载,自汉武帝封禅五岳起,即在曲阳建祠祭拜北岳恒山,此后“历朝祀事为多”。如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杨广亲临曲阳祭

北岳,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河北道郡守也齐集曲阳,并大赦天下。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晋王李克用也曾亲到北岳庙祭祀。明洪武十年(1377年)魏国公徐达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委托曾来曲阳北岳庙致祭。历代帝王祭祀北岳的活动是十分隆重的,唐贞观年间规定,年各一祭,牲用太牢(即用牛、羊、猪各一),祀官由都督、刺史充当。宋真宗时每年祭岳,遣使奉玉册袞冕等祭品,设立道场,举行祭奠,一连三昼夜或七昼夜不等,甚是隆重热闹。”^[3]此外《曲阳县志·金石录》中著录的历代碑刻,大多数也与北岳恒山有关,如汉“恒山下庙碑”、“北岳恒山碑”,晋“北岳祠堂颂”碑,北魏“恒山铭”碑等,这些早期记载北岳恒山的碑刻早已泯灭,仅在古籍中有载。除此之外,曲阳北岳庙内目前还保存着历代祭祀北岳、重修北岳庙的碑刻近百通,如唐开元五年(727年)定州刺史张嘉贞撰并书的“大唐北岳祠碑”,唐天宝七年(748年)“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碑,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6年)“北岳安天元帝碑铭”,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定州安抚史韩琦撰并书的“大宋重修北岳庙之记”碑以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封“五岳”为神的“大明诏旨”碑等。这些历尽沧桑的古代遗珍,至今仍屹立于曲阳北岳庙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曲阳昔日的辉煌。

曲阳北岳庙是汉唐以来历代帝

王祭祀北岳的场所,据史料记载,北岳庙原有“上庙”和“下庙”两处,上庙建于恒山,又称“上祠”、“上寺”。下庙建于曲阳城西南隅,又称下祠、下寺。北魏宣武帝时期“曲阳城迁至今址,庙亦兴建此时,之后历代均有增建和重修。初时规模较小,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扩建。宋淳化元年(990年)契丹入掠纵火焚庙,二年(991年)奉诏重修,至绍圣四年(1097年)大殿增建引檐,布局基本完成。元初世祖特旨重修,于至元七年(1270年)完工。明嘉靖十五年(1660年)增建御香亭(即敬一亭),至此北岳庙的规模达到顶峰^[4]。”古代祭祀岳山被视作天子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的大事,祭祀场面隆重,祭祀场所也十分讲究。北岳庙属于神圣的祭祀建筑,在古人心中,这里是人与神灵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圣地,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历代统治者在营建或修缮祭祀建筑时,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使用最好的建筑材料,务求尽善尽美。北岳庙是曲阳现存古迹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一组古代建筑。据勘测,北岳庙占地南北长542米,东西宽321米,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目前保存下来的建筑共有10座,占地3.8万平方米,其中祭祀北岳的主体建筑“德宁之殿”高25米,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其规模与今存的中岳庙峻极殿、东岳庙的

[3] 薛增福、王丽敏主编:《曲阳北岳庙》,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4月。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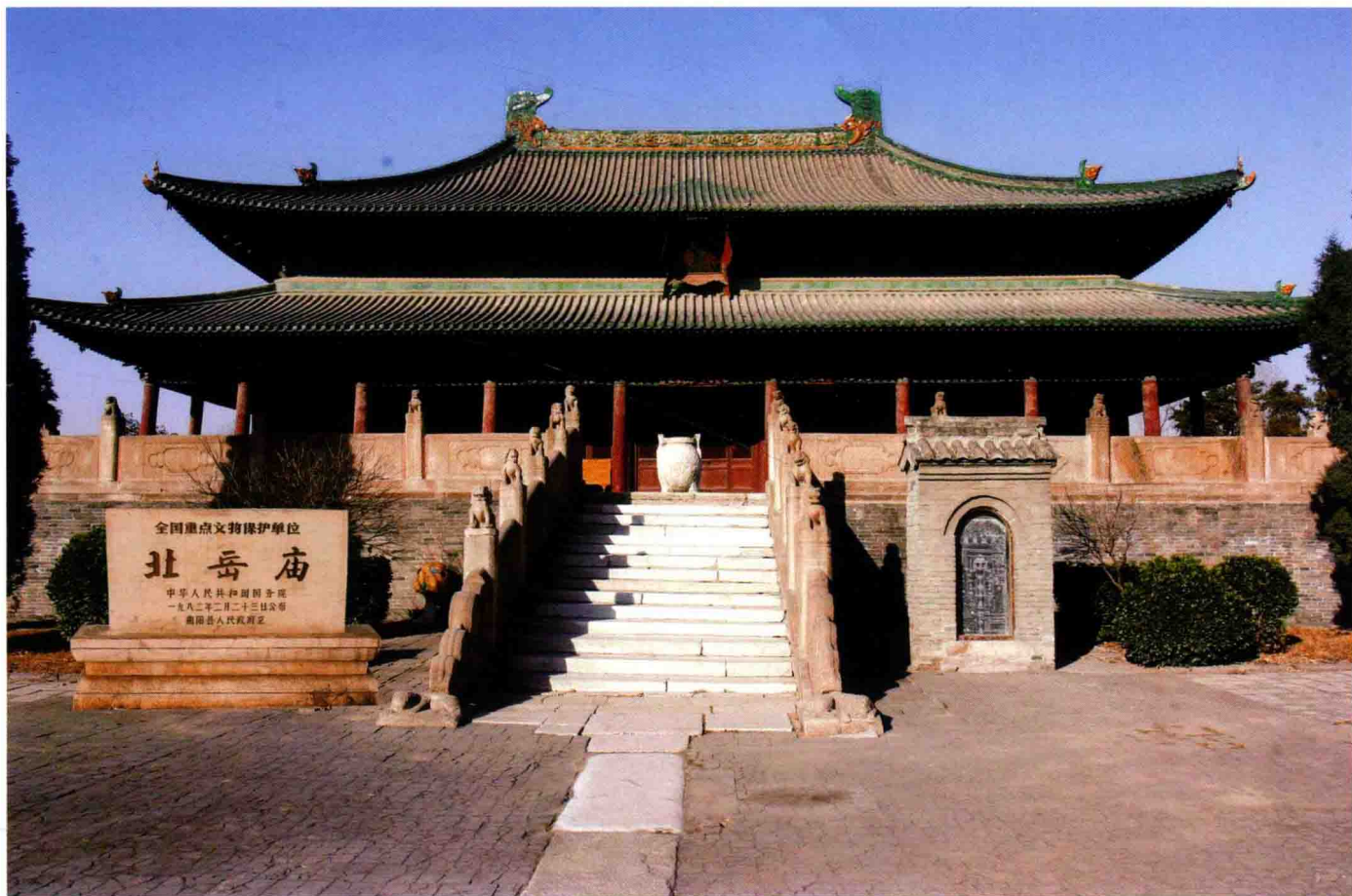


图1.曲阳北岳庙主殿——德宁之殿

天贶殿大体相同，均为重檐庑殿顶。规格高，体量大，显示了岳祀的等级^[5]。”德宁之殿的结构具有明显的元代风格，规模宏大，气势壮观，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元代木结构建筑。北岳庙不仅建筑出色，殿内的巨型壁画更是出类拔萃。“德宁之殿内东西两壁和北山墙背后，均绘有巨幅彩色壁画。东西两侧壁画各高8米，长18米，北山墙壁画高8米，长27米，壁画总面积为504平方米^[6]。”东西壁画的内容据《曲阳县志》记载为唐代吴道子所绘《天宫

图》，但实际应为元代所绘《五岳出行图》。壁画构图严谨，设色富丽，画面人物众多，主次分明，其中主像高达6米，在同期壁画中可谓罕见。画法上采用重彩勾填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人物衣纹以及旗幡彩带飘逸流畅，确有“吴带当风”的韵味，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是元代壁画中难得的精品。北岳庙现存建筑不过是整个庙宇群体的一部分，由此不难想象当年鼎盛时期那种殿宇巍峨、气势宏伟的庄严景象。

随着年复一年的祭岳活动和北岳庙的不断增建重修，曲阳城也得以不断发展，“古曲阳城周五里十三步，而北岳庙则居其半，可见曲阳城是伴随着北岳庙的兴建而发展起来的^[7]。”（图1）

3. 优秀的科技文化传统

从曲阳历史沿革可以看出，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成为北方民族“白狄”建立的中山国的属地，因此它的文化传统与典型中原文化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白狄原

[5] 薛增福、王丽敏主编：《曲阳北岳庙》，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4月。

[6]、[7] 曲阳县文物保管所编：《曲阳揽胜》，2000年12月。



图2.铜错银双翼神兽（战国）



图3.黑陶压光虎纹鼎（战国）

本发源于陕西，春秋时期东迁到太行山以东地区，先称“鲜虞”，战国时期改称“中山”。战国时期中山国是夹在燕、赵两大强国之间的一个“千乘”小国，但其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军事实力也相当雄厚，特别是恒公迁都灵寿之后，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中山国曾趁齐宣王伐燕之际，趁机攻掠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战国策》中对中山国的骁勇善战有这样一段记载：“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在群雄称霸的时代，中山国能够与实力强大的齐、赵、魏、燕并肩称王，充分显示了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在300余年的历史中几经兴灭，其间北方民族的优秀文化与

中原文化相互交融，曾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充分展示了中山国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青铜器中的错金四龙四风方案、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错银双翼神兽等精美文物，艺术构思新颖别致，工艺技巧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器上纹饰除横铸蟠螭、蟠虺、云雷纹外，还有错金银、错红铜、填漆、嵌松石或玻璃等。其铸造方法除浑铸外，还有嵌铸、铆接、焊接、铸接和失蜡法等。有的器物造型结构复杂，有的器物转轴可自由转动且毫无缝隙，有的花纹细如毫发，有的动物形象自然逼真，反映出其铸造工艺的进步。”^[8]出土陶器中的黑陶压光虎纹鼎、黑陶压光几何纹鸭形尊等磨光压花黑陶，造型优美，器表乌黑光亮，配以精美典雅的纹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精美的艺术

品与中原大国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它标志着中山国在铸铜、制陶等当时的尖端科技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中山被赵国所灭之后，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未随之消亡，而是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并日益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故属中山的曲阳有着优秀的文化、科技传统。（图2、3）

4. 佛教文化与石雕艺术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在全国传播普及。北魏统一北方之后，佛教在北魏皇室的支持之下盛极一时，各地纷纷修建寺庙，雕造佛像成风。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开凿于这一时期。据《曲阳县志·山川古迹考》载，曲阳境内的寺院多达70余处，其中修德寺、八会寺、宁定寺、清化寺、祥定寺等著名寺院，都有数量不

[8]《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等的石刻佛像传世。

修德寺遗址位于曲阳县城垣外西南，北隔护城河与城内的北岳庙遥遥相对，南侧是修德寺仅存的建筑物——修德寺舍利塔（图4）。1953年，当地农民在修德寺塔附近挖菜窖时，发现了大量残破石像，许多石像上还刻有文字。此后文物部门对修德寺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和试掘，在一个2.5米乘2.6米的方坑中，出土了2000余件石像残件，其中刻有年款的就有237件，时代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朝。出土的石像中最早的为北魏神龟三年，最晚的为唐天宝九年，前后延续230余年^[9]。发掘过程中，“在坑中曾得一石像拇指，其末端与手掌相接处的直径是9.9厘米，不难想象这全佛的高至少要达10米以上；进一步更可想象到佛殿绝对不是个小寺院^[10]。”

八会寺遗址位于盛产石料的黄山顶端，现仅存开凿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年）的佛龕。八会寺佛龕俗称“千佛殿”、“千佛堂”，亦称“开皇石经”。“佛龕在一石室内，高、宽各丈余，利用山岩巨石雕刻而成，四面皆凿为佛龕。共刻大小佛像78尊，像下俱刻佛经，并刻有佛名。正面刻有‘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经’，题曰‘行唐邑龕，大隋开皇十三年二月八日刊^[11]’。”位于西羊平镇西郭村的清化寺始建于唐代，明清两代都曾重修，遗址目前尚存一座7米高的唐代释迦佛立像和一块刻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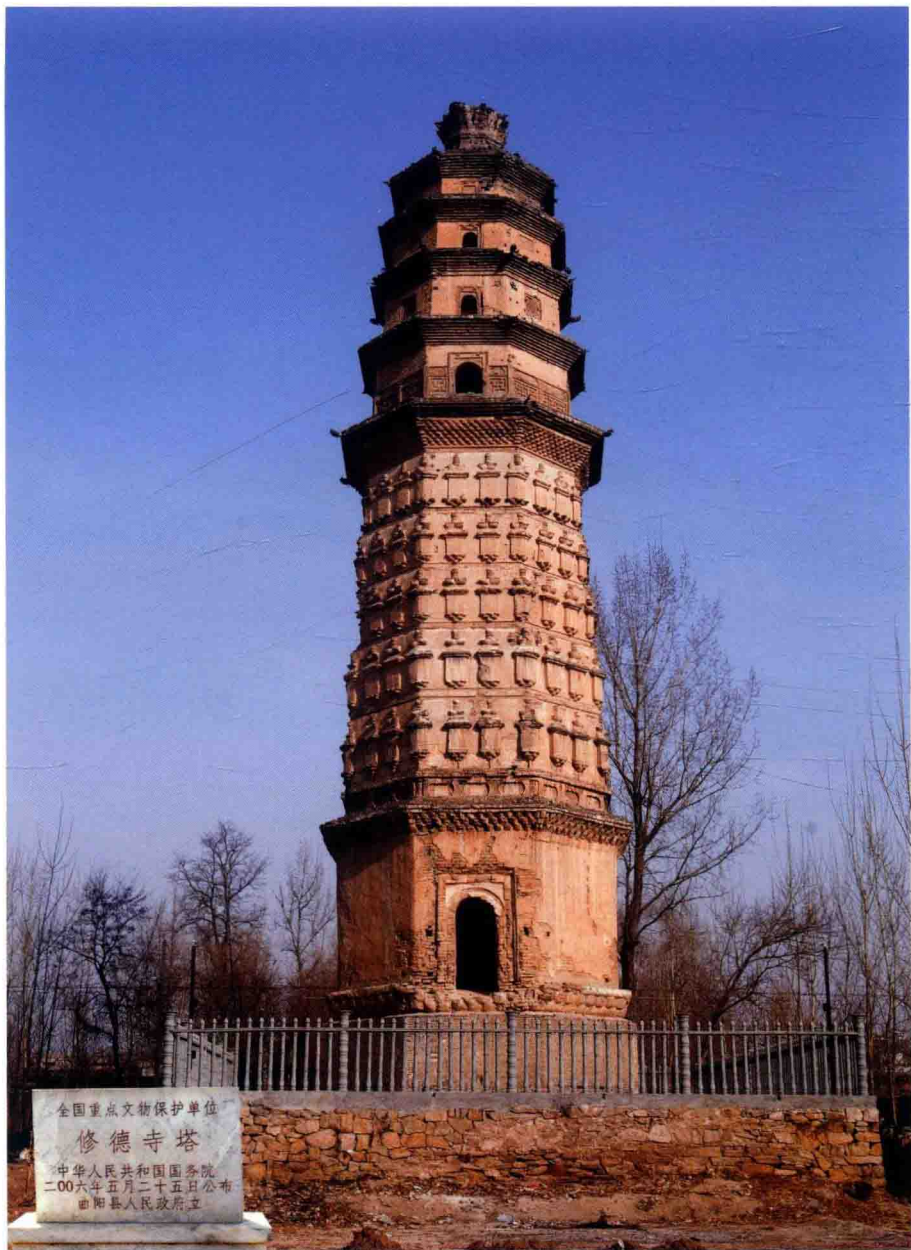


图4.曲阳修德寺舍利塔

正德十一年《重修清化寺记》碑。

曲阳盛产优质石料，曲阳石雕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雕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曲阳不仅是一处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绵延

千年的祭祀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发达的石刻艺术更使其具有深厚的艺术积淀，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定窑最终成为一代名窑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物质基础。

[9]、[10] 罗福颐：《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李锡经《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

[11] 曲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曲阳县志》，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

(三) 考古调查与发掘

定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生产的白釉刻花、印花瓷器享誉中外，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金代后期起，定窑开始一步步走向衰亡，元代以后彻底停产。昔日烟囱林立、炉火冲天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庞大的窑场复被辟为耕地。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著名窑场逐渐被人们遗忘。尽管历史文献中不乏对定窑的记载，但关于窑址地理位置的纪录大多笼统简略，诸如“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12]、“古定器宋时所烧，出定州，今直隶真定府也”^[13]等。而定窑遗址究竟在哪里成了中国陶瓷史中一个难解之谜。

最早发现涧磁村定窑遗址的是我国近代著名陶瓷学者叶麟趾先生。叶麟趾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陶瓷的科学研究和窑业教育，同时也是中国古窑址考古调查的先驱之一。1934年，他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14]一书中首次向世人公布了定窑遗址的准确位置在曲阳县涧磁村。“定州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定州窑地址，考诸文献所载，皆指为今之河北省定县。然经实地调查，则绝无窑址可寻。当地之大白窑村，虽属近似，亦无确实之证

明。或谓自唐以来，所称定州，非只限于今之保定与正定之间者，其地域较为广大，即保定、正定、平定等处，亦皆包括在内，总名曰定州。故凡由此等地方所出窑器，均称为定窑云。是说未免过于广义者，因平定窑当时俗称西窑，其窑器与所谓定器比较，显有不同之点。且保定、正定，亦皆无相当之窑迹也。曩者闻说曲阳产磁，偶于当地之剪子村发现古窑遗迹，并拾得白磁破片，绝类定器。据土人云：昔之定窑，即在此处。又附近之仰泉村，亦为定器出产地，然已无窑迹矣。此说诚有相信之价值，且旁考地理上之关系，则曲阳距定县四十里，唐名恒阳县，原属定州，盖所称定州，乃指其大地名而言，非专指今之定县。即如唐之邢州窑，在距今邢台县约五十里之内丘县，饶州窑在距今鄱阳县即昔之饶州府约一百八十里之浮梁县，是其最明显之比例也。现今曲阳县尚有制陶者，器虽粗糙，然却属定窑之本派。或谓定窑废灭于元末，盖因当时已无优良之品，故无关于此后曲阳之制作也。”（文中提到的“剪子村”和“仰泉村”当为曲阳本地方言“涧磁村”、“燕川村”之讹音）^[15]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叶麟趾先生当年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对定州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

的调查采访，而后又根据当时州县的历史沿革扩大调查范围，最终在定州西北40公里的曲阳县涧磁村找到了定窑遗址。

《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最早刊载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所编的《化学季刊》，之后又刊印了单行本。日本著名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对叶麟趾先生编著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颇为叹服，并于1941年按照书中提供的线索前往涧磁村进行考察。在这次考察中，小山富士夫从窑址采集了1200余片定窑瓷片，回国后发表了《定窑窑址の发见に就いて》^[16]。定窑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定窑神秘的面纱，为科学系统地研究定窑打开了大门，叶麟趾先生的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是中国近代陶瓷考古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他那种“结合当时州县的历史沿革来考察论证的思维方法，更为后世关于古窑址的考据和探索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17]。”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的带领下，我国陶瓷学者系统地对南北方重要古陶瓷窑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1951年，陈万里先生为了确定涧磁村是否就是定窑遗址，亲自到涧磁村和燕川村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窑址的地理位置以及《曲阳县志》中的有关记载，陈万

[12] 明曹昭：《格古要论》，明天顺三年本卷七。

[13] 清唐铨衡：《文房肆考》，清乾隆四十三年本卷三。

[14]、[15] 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

[16] 小山富士夫：《定窑窑址の发见に就いて》，《陶磁》（日本）13卷2号，1941年。根据书中的记载，小山富士夫先生在涧磁村采集瓷片1106片，在燕川村采集瓷片99片，共计1205片。这些瓷片标本分别保存在日本根津美术馆和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1983年出版的《定窑白磁》，公布了小山富士夫先生当年采集的定窑瓷片标本。

[17] 叶喆民：《定窑窑址发现50周年——纪念我国陶瓷界老前辈叶麟趾先生》，《硅酸盐通报》198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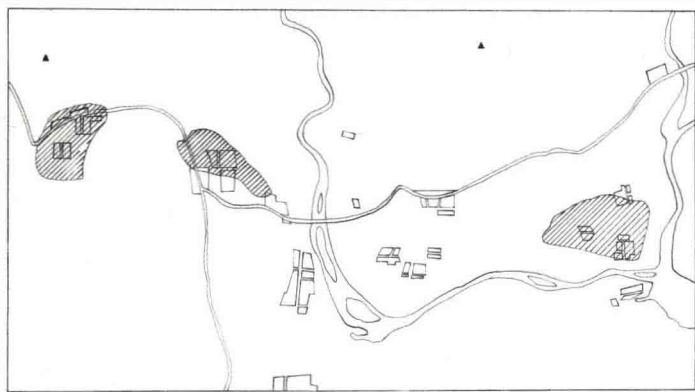


图5.定窑遗址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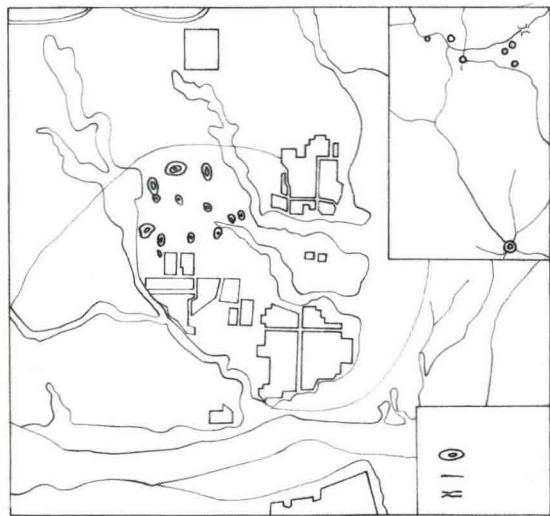


图6.定窑涧磁村遗址平面图

里先生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就瓷窑所发现的遗品说，可以确定此处为定窑遗址，毫无疑问，因为定器有它的特征，如刻画花纹的图案，如釉上所表现的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等，都是很容易与其他仿定的瓷器区别的。”^[18]1957年，冯先铭先生为了解决定窑的上下限问题和紫定、黑定等问题，率领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研究者再次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采集瓷片标本1300余片。此后从70年代起，国内外陶瓷界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都对定窑遗址进行过调查。

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局部试掘，经测量，窑区范围东西长约1400米，南北宽约为1000米。

总面积117万平方米。在调查和勘探的基础上，先后开掘了12个探方，试掘总面积420平方米。“在调查中，共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的遗物35件。在试掘中，前后出土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与窑具26件，铜钱76枚^[19]。”这次试掘根据地层堆积、叠压的情况，参照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首次对定窑的烧瓷历史进行了分期。尽管这次发掘的面积非常有限，对定窑历史分期的依据也不够充分，但调查中采集的定瓷以及试掘所获得的大量瓷片标本，使人们对定窑有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了解。

1985年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定窑遗址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除了涧磁村和东、西燕川村外，又在野北发现了窑址遗

迹。这次调查确定了曲阳县定窑遗址分布的范围：在灵山盆地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1至2公里的狭长地带，分布着三处烧瓷窑址遗迹，自东向西分别为涧磁区、野北区和燕川区。（图5、6）

涧磁区是三处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包括南北镇、涧磁岭、涧磁村西三个小区。南北镇区“位于南北镇村内外，处在定窑遗址的最东端。南北镇内是旧时瓷业中心龙泉镇所在地，现为北镇新村，新村内外分布着许多瓷窑作坊遗迹^[20]。”涧磁岭区“位于涧磁村北，东与南北镇区相邻，两区间以泉水沟为界；西与涧磁村西区相邻，两区间以白石沟为界。涧磁岭基本保存着遗址原来地貌，地上地下到处是烧瓷窑炉和作坊遗迹，

[18] 陈万里先生1951年考察定窑遗址的调查报告见《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1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20] 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曲阳县定窑遗址保护规划方案》，2001年5月。

瓷片、窑具和窑炉废渣俯拾皆是，有的地方堆积厚达10多米。整个涧磁岭上至今还保持着大小不等当地称为‘瓷片堆’的土丘13个。它们是定窑遗址最为明显的标志^[21]。”涧磁村西区“位于涧磁村西，东临涧磁岭区。此区未经发掘，但从沟坎断崖上可以见到窑炉和作坊的遗迹，有的地方有大量匣钵、支圈和瓷片堆集^[22]。”

野北区是定窑三处遗址中规模最小的一处，位置夹在涧磁区和燕川区之间，在“野北村和杏子沟村都有大量匣钵、支圈和瓷片堆集。野北村的北隅曲阳至阜平公路的东西两侧，经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有多处窑炉、作坊遗迹^[23]。”

燕川区“在定窑遗址的西端，亦可称为西区。此区位于东西燕川村内外，它是定窑遗址仅次于涧磁区的又一个中心区域。在东西燕川两村，原来也有相同涧磁岭‘瓷片堆’似的一些土丘，现在多已夷平盖了房屋，在东西燕川两村间的‘大寺’旧址，地方国营‘二矿’场院和西燕川村西南‘坑子地’民宅附近，经考古调查和发掘，均发现有瓷窑作坊遗迹和遗物^[24]。”

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在涧磁、北镇、燕川和野北选择了7处发掘点进行发掘。这次发掘的规模远远大于1960年第一次试掘，发掘总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窑炉、作坊等遗迹，出土瓷



图7.定窑窑炉遗迹（金代）

器、窑具、铜器、铁器、钱币等1万余件，瓷片标本37万余片，为科学系统地研究定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25]。（图7）

2009年9月至12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旨在全面了解定窑各时期产品的总体面貌和烧造工艺特征，为判定定窑始、终烧时间寻找可靠依据。为了全面获取定窑遗址的地层资料，考古队分别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4个地点布方发掘，共布方21处，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

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26]

在涧磁、北镇区域的发掘中，发现并清理了多处自金代至中晚唐的连续叠压地层，为解决“定窑的始烧时间、发展、繁荣的阶段性特征、五代至金的贡御情况、五代至金各期窑炉的结构及特征等问题^[27]”提供了可靠依据。此次发掘还“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其中还有一些仿古代青铜礼器造型的器物 and 精美的瓷塑制品；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碗盘等，都为我们研究定窑贡御瓷器的特征及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28]。”

[21]、[22]、[23]、[24] 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曲阳县定窑遗址保护规划方案》，2001年5月。

[25] 此次窑址发掘的正式报告目前尚未发表，文中的有关数据来源于1987年、1988年《中国考古学年鉴》。

[26]、[27]、[28] 韩立森、秦大树、黄信、刘未：《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2日。